

南匯縣文史資料選輯

第八輯

南匯縣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

一九九一年一月

南汇县文史资料第八辑目录

日寇火烧四团仓镇的前前后后·····	鲍季良 (1)
李家桥战斗姜凯歌·····	陈发新 (4)
一九四九年大团镇救灾记·····	夏炎光 (6)
东海乡望海村的采历·····	龚廷山 (10)
营救丁锡三的劫狱活动前后·····	沈仍桢 (13)
故乡——台湾的见闻杂忆·····	钟招喜 (18)
沈彬儒先生传略·····	沈莹光 (22)
秋花映篱红——记书画老人叶秀山·····	石 芦 (29)
忆生父闵湘帆·····	闵锡金 (33)
承平盛世忆《干戈》·····	王祖望 (36)
解放前夕的一张晚报·····	施超权 (41)
关于《新浦东报》停刊前后简述·····	宋宝山 (44)
曲艺一枝花——南汇锣鼓书·····	胡善言 龚乙生 (46)
记一次迎神赛会·····	王寿民 (49)
南汇城隍庙忆旧·····	黄豫才 (51)

南汇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一月

日寇火烧四团仓镇的前前后后

鲍季良

一九三八年初秋，活动于南汇县境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于陶生部发动所谓纪念“八·一三”一周年而进攻日寇据点的战斗，被日寇反击，四团仓镇惨遭焚烧。经过情况如下：

当时浦东日寇已占领了上海黄浦江沿岸，逐步向浦东腹地蚕食。先后占领了川沙县城、南汇县的周浦、祝桥和奉贤县的南桥，以这些城镇为据点，企图进而侵占全浦东。国民党正规军于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已全部撤离浦东。原在川沙县境活动的忠义救国军第三支队李志明部移驻于奉贤县西部，忠救军第八支队丁锡三部活动于奉贤县西部和南汇县第六区航头一带沿黄浦江地区。忠救军第四支队于陶生部活动于南汇县东部。忠救军的专员鲍步超驻丁锡三部境内，名义上统辖这些部队。这些部队中以于陶生部的实力为最强。于自称南汇县长兼县保卫团总团长，统辖县内各地方保卫团中队。就在“八·一三”一周年前夕，于既不自量力，又无周密部署，更无群众基础，贸然组织所部，分两路进攻敌军据点。一路攻周浦，一路由于自己率领，进攻祝桥。

我这时正在南汇县第二区公所，等待接受工作。区公所设在四团仓镇以西三里路的叶家祠堂内，区长为连柏生，区助理（相当于副区长）为王才林、张以仁。战斗前，于陶生和他的县政府秘书南汇人李庆仁等多人曾到过叶家祠堂，于的部队就驻在四团仓镇和附近村庄里。那几天，这些部队在当地向人民勒索给养，罗掠财物，当地群众无不怨声载道。

八月十二日夜，于部就在祝桥镇四周打枪袭扰，虚张声势，但始终没有一兵一卒跨进祝桥镇内一步。十三日上午，驻祝桥日寇在击退于部后，冲毁据点，沿公路向南追击。于部在四团镇略作抵抗后又向南逃跑。日寇就在四团镇上四处纵火烧房，顿时全镇几百户商店，住户惨遭回禄，其滚滚浓烟，十里外尚能看到。当时鬼子一直退到南汇城内才折回。其中有一部分经城东的软公塘北上，沿途在老港镇一带也烧了不少房屋。此日，在南汇城上空，还有敌机配合，丢下了几枚炸弹。其爆炸声，四团五、六里内清晰可闻。

八月十三日下午，我偕事去四团仓以西的三灶镇，看到于陶生的第四大队胡振海部正在开进镇内，此后，他们就长驻镇上了。听说于陶生其他几个大队仍分驻新场、大团等地，各守原防。

过了三、四天我和连柏生、王才林、王义生、林有璋为了筹组南汇县第二区的地方部队，去泥城经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周大根处“取经”。在经南汇城，过大团时，沿途所有桥梁，已被于陶生部从南汇南逃时，破坏殆尽。我们从泥城回二区时，改道从软公塘北上，看到南汇城东的塘上房屋，也被日寇烧了很多。

又过了一个星期，于陶生部在新场镇开了一个隆重的退悼会，悼念这次祝桥战斗中被日寇打死的第二大团谷守信部的大队副薛某（这时谷部就驻在新场镇上），我和连柏生、王才林、蔡辉等多人为了支持于陶生继续抗日，都去参加了。退悼会由抗建公学的经办人杨谷村、宋益三等具体组织，到会人数颇多。连柏生、王才林代表南汇县二区公所，蔡辉代表奉贤县人民自卫团送了挽联。（挽联由王才林和我草拟，蔡辉写）

会上有不少人登台发言，追悼会开了两小时光景才散会。于陶生部发动的纪念“八·一三”一周年的战斗，也就这样地收场了。

（编者按：作者在看到我文史资料第六辑十二页关于“四团仓大火”一节后，感到有补充和明确的必要。因作者当时正在盐仓附近，对日寇焚烧四团仓的前因后果知之甚详，为此认真回忆，撰文感赐。她老以八十二高龄，犹自关心和支持我县文史工作，特此衷心铭谢）。

李家桥战斗要歌

陈友新

李家桥战斗是发生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当时汪伪军因失去了靠山而惶恐万分。那时驻南汇大团伪保安队第二团第一大队的大队长顾桂秋，按照国民党军统特务初金泽的指令，串通在万祥、彭镇等地的几个伪军中队五、六百人，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第三战区苏皖行动公署的先遣总队，并把原来中队改为支队番号，由顾任司令。八月十八日，这批家伙，集中到李家桥（新场西）的胡梦舟宅子里，准备去周浦整编。这时，我军也已从奉贤北上，准备进驻南汇各城镇，部队就驻在离胡梦舟宅子三里地的西方家浜。原支队长朱亚民已去湘西，支队由支队长张席珍及政委金子明负责。我军在闻知此敌情后，立即集中中队干部开会，部署战斗任务，坚决消灭这股残敌。凌晨二时，分兵两路，南路由支队付张席珍及杜锐率领六中、警中自西向东，北路由灵活中队中队长沈志明和我率队沿五灶港向东进击。当时我军人数只有敌人的三分之一，但由于我军斗志高昂，战略战术得当，而敌人则是乌合之众，不但还带有家儿，战斗力很差，所以我军开始进攻以后，敌人即闻风丧胆，纷纷缴枪投降。顾桂秋等进驻保险楼（又叫炮楼），企图顽抗。但经不住我军的强大攻势，结果都扯起白旗（白衬衫），缴枪投降。这次战斗除活捉敌正、副司令顾桂秋、张桂芳外，并俘敌五百多人，缴获枪支弹药及轻重物资无数。这些战利品除对六中、警中、灵活中队加强了装备外，还支

援了组建中的部份区中队。我军牺牲了教导员徐黎、中队长沈志明、战士潘鹤林等六名同志。

李家桥战斗是我军在浦东抗战史上升敌和缴获最多的一次战斗。对战士的鼓舞，战斗力的增强以及日后的解放战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抗战八年中，我军在浦东与日、伪进行过许多大小战斗，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从未为胜利而专门创作歌曲加以传唱。唯独这次李家桥战斗胜利后，由于在形势和环境等多方面的条件下大有以歌曲的形式来歌唱这一重大胜利的必要。于是我即参照当时新四军浦东纵队印发的《歌唱观杰连》的歌词拟写了李家桥战斗之歌的歌词。经政委金子明同志同意后，以《歌唱观杰连》的原调在战士中教唱。其歌词是：

八月的稻子金样黄，

李家桥战斗胜利结束了。

敌人吹起了悲哀的投降号，

他们个个举手，解除了武装。

缴获机枪十多挺，俘虏敌人五百多，

我们的队伍打了大胜仗，打了大胜仗。

在激昂的凯歌声中，我们继续走向新的胜利。

1949年大团镇救灾记

夏炎光

1949年7月24日，我县遭强台风袭击，下午五时许，友人刘金海等采访，得知团东沿海地区，在狂风、暴雨、巨浪的侵袭下，海塘决口，塘内地区一片汪洋，人畜淹死无数，哭声遍地惨不忍闻。如此海潮泛滥，灾情之严重，为以往所罕见。我镇靠近灾区，在此紧急情况下，身为镇商会会长加我，理应立即发动群众，支援灾区，抢救灾民。当即通知镇上所有附设糕饼作坊的杂货店赶制面饼，全力支援灾区。我负责的大丰杂货号立即带头先行。一方面，组织市河内所有船只，全部出动，推选身强力壮的同志负责载运救灾物品，前往灾区发放，并嘱咐把无家可归的灾民抢救采回安顿。

深夜十一时，船只陆续返镇，并接回灾民九人。由大丰号首先收养一人，其余分别寄养较大店中，内有妇女一人，即联系有主妇的商店，使于照顾。安排就绪后，即邀请有代表性的人士召开紧急会议，对如何组织救灾以及开展募捐等活动，作出了初步安排。

二十五日上午，召开全镇绅、商、学及各界代表会议，讲明东乡水灾严重，我镇必须有组织地开展救灾工作。经过讨论，定名为“南汇县东乡水灾抢救委员会”。推选出：陈慕韩、严赞平、沈宏宽、吴国璋、韩鸿洲、马文衡、盛幼宣、黄锦伯、盛汉珍、盛哲民等六十多人任委员，并推举我为主任。我当即婉辞，建议请新任大团镇第六办事处主任张耀明慕主任。经大家同意后，我任副主任。另请盛汉珍任

文候、盛哲民任会计，盛关福任干事。会址附设在镇商会内。为了日后工作的方便，另设驻沪办事处，请董祥生主其事。即日起开始工作。

接着，假座“福音堂”召开全镇群众大会。受张主任委托，由我主持大会。在会上，我详述了沿海灾情的严重情况，并阐述了大团与灾区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只有使灾区早日恢复生产才能使大团的经济繁荣。我们必须发扬大团镇人民的优良传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全力支援灾区。

当时会场上群情振奋，当场就有原大团兴业银行经理举手发言，慨捐面粉二十包，这大大激发了救灾热情。

大会结束后，待慈临纪米镇的灾民有四十多人。当即联系北街关帝庙，暂作灾民收容所，并为之解决迫切的生活问题。同时同镇上草包厂挂钩，指定专人，对有一定劳力的灾民教以简单的纺织操作技术，实行生产自救。

每个救灾会委员，除自己带头捐钱、捐物外，都顶风冒雨，不辞辛劳积极参加救灾、募捐活动。

一天，我在南街途中，海东中学工友周全生将一纸条塞入我的衣袋中，並说：“聊表寸心，请不要留名。”我当即取出一看，乃是一石米票。（当时每石大米156市斤）我说，你这种精神太好了，但我们对所有捐献钱物，都要入账。将来救灾结束，对每笔捐赠的米龙去脉都要向群众交待，现在崇尚实事求是，我们还要把你的这种高尚行为进行宣传，扩大影响，把救灾工作做得更好。又如镇上同济济国药号主人盛勇石要盛哲民同我到他家一见，他说你们救灾会工作不久，

成绩卓著，使我感动，今天我也整理出衣服四十三件，请发送灾民，聊表心意……我们代表灾民对他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不日，有上海《新闻日报》社记者三人，来团采访，我们将救灾情况作了具体介绍，深得记者的赞许。翌日，在日报上把大团镇的救灾工作作了详尽的报导，这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后来，松江专区副专员兼沿塘专员吴建功同志来团视察灾情，离大团镇同昌百货店，当我前去汇报了大团镇救灾情况后，他说：“你们的救灾工作已从各方汇报及报上的报导中略知一二，听了你们的介绍，又使我了解到大团人民的救灾热忱，对救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灾区人民定会深深的感谢你们，还望继续努力，把生产救灾工作做好……”。他的鼓励和鞭策，更增添了我们的斗志。

海水退后，我们把社镇灾民，一一迁送回家，灾民对大团镇人民的关怀照顾感激万分，离别时，都热泪盈眶，依依不舍，真是不似亲人，胜似亲人。

救灾工作基本结束后，大团镇政府（第六办事处）假座大团小学操场，召开万人大会，由办事处宣传部长潘烈同志主持，作了救灾工作的总结发言，表扬了救灾工作中的许多积极分子和有功人员，我也被评为“救灾功臣”。但我始终认为，这主要是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威望以及全镇广大人民的力量，在旧社会，要做到这点是不可能的。

事后，救灾会还将经手的所有救灾的捐款、实物、各项支出以及发放情况，由文牍加以集中整理，汇编成《征讯录》一册，分送上海、松江、南汇及本镇有关单位和热情支持的广大人士。一方面，便于检

查核实；又是作为这次救灾工作的纪念品。此举亦深得群众满意。

南汇党和政府在做好所有沿海灾民的重建家园、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的同时，还成立了《南汇县生产救灾借贷委员会》，进一步对灾区人民在经济上给予援助和支持。其组成成员为：主任：牟能（南汇县县长）；副主任：夏虞弼（按即作看）；黄寄洲（周涇）、苏东元（下沙）。

“望海楼”和“望海村”的来历

奚 延 山

解放前，本县东海边有个名为“望海村”的小村子，当时属祝桥区长沟乡，就是现在的东海乡义洪二队。在一九二〇年，“大英帝国”在这个村里建造了一座高五十米，底座二十米见方的高塔，名谓“望海楼”，当地人又称“洋台”（登高瞭望的意思）。实际上这是航海用的标塔，也是长江口外唯一的一座航标塔。航海家有句俗话：“大海里航行，白天依靠山和塔，黑夜看清洋里灯”。吴淞口外的中外船只，就以此望海楼为标记而掌握航向。自从这村有了望海楼后，望海村的名字也就叫开了。

在半殖民地旧中国，帝国主义自可在我国土上为所欲为。这座望海楼的建立，当然是为了帝国主义在我国航运的方便，而实质上也是侵犯我领空领海、领地的一个方面。

这座航标塔一共建造三次。第一次建成后，毁于一九三〇年秋；第二次建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四六年秋，与第一座一样，被台风刮倒塌毁；这两座标塔都用木结构建造，四个柱头采用八十公分榫根方型花旗松木，大脚埋入钢管混凝土地基，五节被方米字梁以铜螺栓连结搭成，顶上设有八方米平台，中央竖木杆一根，用以升降直径三米的中空竹制大圆球（俗称“风球”），升起时表示有七级以上大风，为了达到永久性，同年，改用钢结构重建，外形虽小于前二只，但确是非常坚固，虽有十二级台风侵袭也不会倒。此塔建有一百二十级

的扶梯可攀登平台。在正常气候下能清晰地看到上海高层建筑及南方大小洋山。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由上海航运局接管。从此，此塔完全由中国人民自己掌握和管理。

英国人在建塔同时，就设立了东海水文站，派来了受过专业培训的老宁波从兴和老崇明董志义（董死于一九四九年大水灾）等四人在此工作。他们在几十年里日夜记录着各项气象。水文数据资料，直接报送英国领事馆。

建塔初期，四周有铁丝网围圈，业挂有“华人止步，严禁攀登”的八字令牌。日子一长，几个工作人员与当地群众逐步熟悉，有些好奇青年，也可得到攀登塔顶的许可。在夏天，有时还带了民族乐器在顶台上纳凉时吹吹打打，说说唱唱，扬音三里之外。

在抗战期间，我三五支队海防大队曾利用它进行海上游击活动。为进出港口，来往于浙东带来了方便。如一九四〇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日伪军突然来长沟一带大扫荡，部队紧急疏散，隐蔽。当时常备队长潘林儒等四位同志，被追向海边转移。因寒冬腊月，滩涂一片光秃，毫无避身之处。正在万分焦急之时，发现远水浅滩上有只小船，立即蹚水登舟，划向大海。在风浪里飘弋了一整天。幸亏有这“望海楼”这个明显的目标而没有迷失方向，更没有误入险区。直至傍晚，估计鬼子已走，才循着标塔方向回岸。但此时个个已冻得身手僵硬，经全力划回登岸时，潘林儒同志已处于不克状态。其余也都精疲力尽。幸被附近农民发现扶到屋里，紧急烤火，更衣，喂水。至半夜以后才逐渐恢复，破晓，又匆匆归队。一九八五年，潘林儒同志从苏州市委书

记岗位上离休后到南汇，曾托人寻找教过他性命^的恩人，但由于当时未留下姓名，再加上四十多年中变迁很大，故始终未曾找到。

这座标塔还为当地渔、牧渔民提供气象参考。如洋台风声，“风球”能见度，水文员透露的消息等。这不仅对耕种、放牧、出海捕捞等带来方便，同时也增添了一定的科学知识。

一九五五年前，国家航运部门在离此塔东五十里处海滩上另外建立了现代化的中经航标，随后，已将此“望海楼”拆去。但“望海村”的名字，依然深印在当地人民的记忆中。

营救丁锡三的劫狱活动前后

沈仍领

1944年3月18日，汪伪如镇江模范监狱内发生了一起重大劫狱事件。当时主要是营救因起义未成而被汪伪关押的原汪伪十三师师长丁锡三。同时被救出的还有新四军干部及汪伪师长等十余人。事发后，引起了日伪的疯狂追击、封锁，但由于事先已和新四军联系而得到及时接应掩护安全转移，使劫狱获得成功。此事因我为主要参加者之一，对当时的情景印象深刻，记忆犹新，特予记述，以供史料研究之参考。

丁锡三，曾名丁旭文，奉贤县朱家桥人。为人豪爽正直，富有爱国热忱，曾是一名汽车驾驶员。上海沦陷后，丁和袁英杰等组织抗日游击队伍——“苏浙行动委员会浦东游击总队”。丁任第三大队长。在日寇扫荡中丁曾惨遭杀害，这国恨家仇，更激发了丁的抗日决心，誓愿灭此朝食。

1938年，被日伪诱降，所部被改编为“浦东保安队”，期间丁曾设计诱杀伪维持会长及日军代表。随后，即改编为国民党苏浙行动委员会第三支队，后又改编为第八支队，丁任上校支队长。1939年10月，受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何行健的节制，投靠了汪伪，又改编为汪伪和平建国军暂编十三师，丁任师长。1942年，十三师驻在浙江绍兴一带，辖有二五、二六两个旅和一个教导团，约万人左右。是年12月，丁认为时机成熟，毅然决定率部起义，惜为内奸二六旅

长宋立志告密。日寇即以仇田师配合海军将十三师包围。结果，丁被俘，解南京。汪伪判处丁无期徒刑，后关押在镇江模范监狱。

我在1938年和周士熊、邵平、潘毅等一起参加丁部，立志抗日（时丁为第八支队长）。我们对丁的抗日言行向为敬佩。后丁被军汪伪后，我实迷惑不解，内心苦闷异常。幸有大队副潘毅和我私下谈心，认为丁决不会甘当汉奸卖国，他在等待时机，我等应暂作忍负。果然于1942年12月，丁决定起义，但不幸失败。在丁判刑关押后，我和周、潘等秘密逃离汪伪军，分别潜伏安全地带，一直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决心，始终秘密联系，为营救丁而积极活动。

我们一致认为，要营救丁出狱，必须取得新四军的支持和援助，而且认识到丁出狱后要继续抗日的话必须投奔新四军，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所以我们想到了原十三师的青年军官孙皎，他是丹阳人，是个赤诚的抗日拥护者。那时他在杭州附近当伪保安队队长，他和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有密切的联系。于是由周士熊去找孙，说明我们的打算。孙极力支持，即向杭州中共组织报告，并取得了介绍信，欲去茅山地区中共党组织联系。但正值日寇疯狂清乡，故未得成行。孙皎又通过他的亲戚——丹阳夏墅乡乡长尹致生（中共地下工作者）的介绍，周、邵终于找到了中共地方组织。当时有丹北中心县委书记和铁道工委副书记董必成（公开身份是保安司令部参谋）接见。周、邵谈了劫狱的打算，说明有关劫狱的整个行动，完全由我们负责，主要是劫狱成功后，要求新四军给予接应，帮助转移到安全地点，今后将重返上海近郊继续从事游击抗日。部队领导当即让周、邵住下，说

是要郑重研究后决定。几天后，董必成同志代表组织郑重对周、邵说：经研究了十三师的情况，丁锡三将军率部起义，有利抗日；他失败被俘我们深表同情；你们准备劫狱营救，更有利抗日，这符合民族利益，故我军坚决支持……。

当周、邵把这消息带回来时，我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时在1943年秋。

接着，又和丁师长夫人说瑞芳从长计议，积极准备营救工作。丁夫人就在监狱附近租了一间小屋，和新生婴孩及保姆一起住下，借着探望丁和送饭的机会，对丁传递信息，并得到了丁本人的配合。对监狱的地形、位置、人员、武装力量及监狱日常活动的规律作了详尽的了解。后来又得到由丁在狱内直接策反监狱看守倪明即帮助，取得了监狱平面图及警卫武装分布图。随着时间的推移，丁夫人出入监狱已成惯例，监狱人员对她也已熟悉，戒备也就松懈。我们又多方了解镇江、上海、杭州等地的军政动态和交通道路情况。最后，我和邵平还亲自到镇江监狱探望了丁师长，告以行动的日期和步骤，并核实了倪明和丁夫人提供的情况。见面后，以大谈生意为掩护，我告诉他我们的公司将在最近开张，资金雄厚，股东都是名流，生意保证兴隆等等，临别时示意丁必须保重身体，在眉眼间相互传情，各自领会，邵平还把一些准备券送给了看守人员。

在各方面的条件成熟后，我们就有邵平、潘毅、陆彭令、吴绍平、邓长义、陶安富、孙祖纪、张承之、周士照和我十个人成立了一支劫狱队，决定在1944年3月18日行动，并作好严密分工，大家立下了